

為「重走文物南遷路」留下了音像紀錄

參加因緣

五月上旬我甫從挪威奧斯陸參加二〇一〇世界電影資料館協會（FIAPF）年會回來跟莊靈先生聯繫，除了和他分享大會對於影像維護與保存的最新趨勢，同時也跟他說明我們（南藝大）對《劇場》雜誌的維護與保存計畫的進度，莊先生曾任職於台視新聞部多年，是一位資深的新聞攝影師，也是一九六〇年代十分著名且極富影響力的前衛刊物《劇場》雜誌的發行人，我即是因為「台視新聞影

片」與《劇場》雜誌維護與保存計畫之因緣與莊靈先生結成爲好友。

我自一九九七年追隨漢寶德先生到台南辦學至今，在台南藝術學院裡創立了音像紀錄研究所，日後因爲改大而成立了音像藝術學院，十多年來一直從事培育紀錄片人才之工作，在此同時也成立了「台灣歷史影像資料庫」專門維護典藏台灣新聞與紀錄影像，這裡最著名的典藏品就是台灣電視公司從民國五十一年開播至民國七十六年電視台改爲電子攝影之前的

井迎瑞



每日新聞影片（原始之十六釐米膠片），數量超過一百萬英尺，多年來我們站在歷史與文化的高度無條件的做著影像維護與保存的工作。

至於《劇場》雜誌，是成長於一九六〇年代世代共同的記憶，在那思想禁錮的年代它爲台灣開了一扇窗戶，讓當時年輕人能呼吸一點世界的空氣，然而《劇場》雜誌僅僅出刊了八期就嘎然而止，或許由於它前衛的風格與當時的社會氛圍與藝文環境格格不入，導致於國內大小圖書館鮮有

典藏，今天對於研究台灣前衛藝術發展十分重要的刊物學術界竟然無緣得見殊爲可惜，由於本校與莊靈先生之關係與因緣，幾年前我就倡議在「台視新聞影片」之後，繼續由南藝大來維護並出版《劇場》雜誌紀念版以彌補這段歷史的缺塊，此想法立刻就得得到莊靈先生的認同，約在一年多前莊靈先生保有一套完整、但十分老化脆弱的劇場雜誌就交到我的手上了，經過漫長的技術與行政作業程序，目前南藝大正在進行維護作業。

當我們在談《劇場》維護計畫的進度時，得知莊先生受國立故宮博物院之邀將於六月初參加一個名爲「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的活動，我深感此活動之重要性，當時即毛遂自薦能夠隨行拍攝紀錄片做全程紀錄，莊靈先生覺得這個構想不錯就跟故宮轉達了這個想法，同時我也與故宮教育展覽處朱惠良處長通了電話，我這個提議獲得朱處長、旋即也獲得故宮博物院首長的同意，確認我率領一名研究生隨行紀錄，這樣的紀錄未來對於教育事業與文化傳承都會有幫助，對學校或故宮都是一件好事，我給朱惠良

處長的信裡說：「我和莊靈先生正是因爲這批新聞影片而相識相惜，多年來我也一直守護著這批珍貴史料與文化資產，讓這批影片能遠離政治紛擾與媒體環境之變遷，在烏山頭水庫邊得到最好的保護，這和故宮保護著國寶南遷來台不是同一個故事，同一個主題嗎？」對於維護與保存《劇場》雜誌又何嘗不是，南藝與故宮所維護的器物與媒材或有不同，但維護國家文化資產的理想與立場是一樣的，我很高興能有機會爲故宮國寶與曾守護過它們的人做一點事情，他們的故事需要被講述，用我的專業與對於文化的理解。

設定目標

在行前我仔細的做著功課，除了研讀故宮同仁那志良、莊嚴、歐陽道達諸位先生之著作外，更與我的學生黃毅恆討論工作的分配、拍攝的角度、傳達的訊息等，今年的六月天異常炎熱，我們的情緒也隨著期待而更加沸騰，我從一個記錄者的角度，整理出了我們此行設想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

全程紀錄——強調新聞性與文獻性，是有關人、事、時、地、物當下發生的狀態，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故宮的「歷史紀錄」，我們會盡量完整紀錄整個旅程過程，事情如何發生我們就如何紀錄，拍攝第一目標是「紀錄」，而不是「再現」，換言之此次拍攝不是以短時間內以完成一個電影作品爲目標，而是將這些素材做爲故宮博物院的院史與文獻。

第二個目標是：

田野調查——強調環境之探勘，要去探索、發現新的事證與史料，包括當事人之口述歷史，也包括此行兩岸故宮同仁當下（現場）之反思，對於我做爲一個紀錄者而言，此行性質亦是學習、理解、蒐集資料。

第三個目標是：

醞釀主題——從「脈絡化」的理解中，找出故事性與未來拍攝主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不排除未來會有第二、乃至多次造訪，針對特定地點、人物、事件做更深入的紀錄。

旅途感懷

我隨著台北故宮同仁一行九人六

行又有什麼價值的確是個有趣的題目。

我是從兩個身分來看這個問題，首先是從一個團員的身分來看：紀錄的目的有三，這也是在出發之前即訂定之目標：

- 一、紀錄——強調文獻性與即時性，並力求完整，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院史」，將來人們來看今天的「院史」，將來人們來看今天的這些紀錄不會僅以一個單一的事件來看，必然會放在文物南遷的脈絡中理解，是七十年前故宮人如何保護民族文化資產的一個延續，兩岸故宮人以今天聯合重走文物南遷路之具體行動，來宣示兩岸故宮合作與交流的意願，開始討論七十年前故宮文物南遷的意義，也醞釀了一個新的課題，那就是未來的出路，揭開了兩岸故宮人將在保護民族文化資產的歷史工程中的一頁；
- 二、發現——經過田野調查重新找出新的物證與史實，包括當事人之口述歷史，也包括此行兩岸故宮同仁當下之反思，是一幅記錄與反

芻的交織圖像：

- 三、再現——從此次考察過程醞釀未來拍攝主題，透過講述再現某種觀點與課題。

其次是從一個學者的身分來看：我關注於「紀錄」的美學思考，大致有四個面向：

- 一、紀錄的本質是什麼——我認為紀錄是歷史書寫，紀錄是話語建構，紀錄更是反思與抵抗。不可諱言當初南遷的發生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今天我們除了緬懷故宮前輩保護文物的艱辛外，更須把這段南遷經歷做後殖民的解讀，過往由於國共戰爭與意識形態的不同，使得這段南遷歷史及其意義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掩蓋，也由於國共戰爭的內耗而使得在人類歷史上因為法西斯逆流所引發的悲劇與浩劫並未受到深刻的檢討，今天的紀錄不僅是書寫故宮的「院史」，更是站在人類文明史之高度要持續對於法西斯霸權，乃至軍國主義、殖民主義不斷的反思

與批判，這是人類自我救贖的一種巨大的工程，我們不好好處理它人類就不可能跨越悲情，換言之這項工作是超越黨派，超越國族，更是超越故宮「院史」的範疇，我們應以更全面更宏觀的角度理解「紀錄」，而故宮文物南遷史應是人類解構與抵抗軍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人類推展後殖民工程的一個案例研究。

- 二、「音像紀錄」的意義又為何？——活動影像（moving image）是二十世紀人類一項偉大的發明，開啓了一個世紀的影像文明與媒體文化（media culture），二十一世紀的數位科技與新媒體文化也都是延續人類對於活動影像的記憶，不可諱言未來的世代對於影像的需求將遠大過於今天的世代，他們解讀影像的能力也將勝於今天的世代，我們不能忽視影像與未來世代的對話與溝通的功能，我們今天的「音像紀錄」將是明天的「影像話語」，是為與新的世代對話預做準備。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庫房 傅中攝

月三號由台北出發，到南京與北京故宮十九位同仁，後來又加入了十二位南京博物院的同仁，還有六位隨行媒體朋友，一共四十六位團員，就從南京出發開始了我們這一趟「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之旅程，從六月三號到六月十八號為止，我們一共走了四個省、九個市，翻越秦嶺，全程近萬公

里，重訪當年國寶存放地點，體會故宮人守護文物的艱辛歷程，也對這段歷史進行考據與補遺，發生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故宮文物南遷，是人類保護文化遺產的一個奇蹟，整個南遷從一九三三年起經歷十多年的顛沛流離，部份故宮文物也因此遷到了台灣。

出發前我雖詳讀一些有關故宮文物南遷的著作去想像南遷過程的艱辛，然而這與自己能親自走一趟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回到歷史的現場那種臨場感讓體會更為深刻，我們走一樣的路看一樣的景物，想像如果前方等著的是龐大的未知與險峻的山路，後方追趕的是敵機的轟炸與戰火，自己要運送著百萬件祖先留下的文物那種壓力何其之大，感激之心油然而生，正因為有他們的努力，今天我們乃至於全世界人類才得以承繼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窺中華文化的成就與高度，一個記錄者的專業要求是理性與客觀的態度，可是當我們追隨前人的足跡走訪當年文物存放地點時不能不被那歷史情境所感染而為之動容：在岷江邊抬頭仰望樂山大佛，低頭俯

瞰滔滔江水，心中升起的卻是濃濃的歷史滄桑感，江水滔滔千年未變，大佛無語都看在眼裡，文物曾經走過這裡，我們曾經走過這裡，一樣的江水一樣的大佛，彈指間七十年已過，江水串起了歷史，大佛之眼就是中國之眼，看盡了歷史的滄桑，人來了又走了，然而江水長流文物也要常留，此刻我們經過，而我們的經過並非孤立而單一事件，它是延續了七十年前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江水是一條繩索，將我們和七十年前的文物南遷做了連結，而形成了一個脈絡。

美學思考

六月十六日在考察工作總結會上，會議的二位主持人：台北故宮的領隊朱惠良處長與北京故宮的領隊李文儒副院長，要我談談我對此行的觀察並闡述「音像紀錄」的意義。由於媒體文化與現代生活密不可分，攝影機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並非新鮮事，小家庭聚會、結婚宴席，大至會議、慶典，大家對「紀錄」這件事習以為常，但是它的意義是什麼不見得大家都想過，而「音像紀錄」對於此



往安順華嚴寺途中，濶故知新，圖為專用巴士內 朱惠良攝

三、「重走」的意義在哪裡？——我十分好奇當年文物南遷對於文化認同與國族建構意義上到底產生了哪些影響，這項文化的遠播，對於後來台灣的現代化又起了哪些作用？對於音像紀錄而言「重走」即是「重看」(revisit)，透過重走把視野聚焦於歷史之見證，然而兩岸故宮「一起」重走的意義又為何？我認為「一起」

我們的生活經驗裡，短短的時間當中已經經歷了多少的規格與記錄工具的更迭，而每一次工具的更迭與規格轉換過程當中有多少人類的活動紀錄流失掉了？財團與大企業壟斷並綁架了我們的需求，他們站在使用之便利性與經濟性考量無可厚非，可是對於長久保存人類活動影像歷史卻避而不談，好像它會自然發生迎刃而解，而數位資料更加不可靠，想想我們家裡還有多少以前的Beta, VHS, 8釐米、DVD格式的「家庭電影」，壞掉或無法讀取？從保存人類集體記憶與文化資產的角度而言，大家難道不心疼。

數位典藏

「數位化不等於保存」這個說法是二〇〇九世界電影資料館協會(EIAF)在阿根廷年會時所提出的一個概念，他們將醞釀作為EIAF官方立場：「影片如果妥善保存其壽命可達幾個世紀，而數位資料夾壽命不超過十年，數位影帶則不超過三十年，數位化是一種讓影片內容與資訊流通的

的意義是提出了一個意願，一個願意重新解讀歷史的意願，一個開始理解對方感受的意願，如果當一個社會在文物面前開始顯得謙卑，開始願意重新從中受接薰陶與涵養時，是不是會為兩岸對話帶來新契機，兩岸的歧見是不是會更少？

四、媒材與紀錄的關係何在？——因為時代不同物質條件不同，紀錄的媒材與載體因而不同，例如：甲骨、青銅、石刻、簡牘、縑帛、紙、膠片(賽璐珞Celluloid)、新媒體數位元件、等等，因為物質條件的不同因此記錄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刻寫(如甲骨文)、銘鑄(如鐘鼎文)、手抄(如「寫本」、「抄本」)、雕版印刷(如刻本、刊本)、活字印刷(西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宋朝畢昇的泥活字)、攝影(如一八三七年法國人Daguerré: "Still Life in the Artist's Studio")、等等，然而「電影」與「膠片」都是工業革命之後的產物，是一種

方法，對於保存與維護影片是不適合的(Trilevant)，當今更艱鉅的挑戰是如何保護那些一開始就是用數位記錄的東西。」

這樣的說法無異是給我們全國上下在進行的「數位典藏」敲響一記警鐘，簡言之「數位」不等於「典藏」，把「數位」與「典藏」放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說「數位」適合流通，不適合典藏，我們全國上下一心追求的「數位典藏」，應該改名為「數位流通」，以免誤導誤事，數年前美國太空總署就曾發出警訊，早期的航太資料因為數位格式的改變已經不能閱讀，紐約時報記者Michael Chaplin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曾為文指出：「美國影藝學院公佈研究報告Digital Dilemma (數位困境) 指出其儲藏數位作品平均一年儲存與維修成本是一二五—一四美元，傳統film則僅需一〇五—九美元，如果一部影片完全是經過電子與數位生產的話，則保存成本更高達二〇五—八六九美元，傳統材料僅四百八十六美元，Celluloid可放一百年，電腦周邊硬體設備也並不耐用(Enduring)，假使不經常運

新興媒材，賽璐珞是一種柔軟、強韌又具彈性的一種媒材，可將感光藥膜附著其上，這些便於把活動影像紀錄在賽璐珞的藥膜上面的特性是其他時代裡的媒材所沒有的，正是由於這種的特性讓記錄活動影像變為可能而再現了二十世紀人類觀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與視覺經驗，

開創了往後一個世紀人類的活動影像文明。然而，活動影像的載體比起青銅器、石碑、乃至紙張、相對而言事比較容易毀壞的，這是它先天的侷限，我們一方面享受來自於「賽璐珞」給我們帶來的便利與「擬真」，然而一方面又必須及早面對可能由於物質的毀壞而產生的歷史遺失與集體失憶症。而當今流行的數位科技比起「賽璐珞」(膠片)更為不可靠，因為膠片保存記憶的功能已經有百年的歷史，它的可靠度至少已被它自己的歲數得到了印證，而「數位」科技是一個發展之中而方興未艾的媒體，在

作，一個硬碟可能二年內就會當掉，DVD的壽命也不超過十五年，目前好萊塢的三百六十億美元年營收有三分之一來自影片庫存」，這些說法也都呼應了EIAF的憂慮。

「先維護後數位化」是我多年來一直呼籲的概念，未先妥善作好維護工作而貿然數位化，很可能對文物或珍貴影像文化資產造成傷害，尤其是影像文物，大家也不給時間也無耐性做好影像文化資產維護的工作，財團一方面創造流行與品味，鼓吹追求新的科技成為政治正確，不時刻追求新科技就會有焦慮，時時刻刻推出新款手機相機等設備，消費者成為追求科技產品的奴隸，每次紀錄的機具與格式轉變時會有多少資料會流失？有多少會經過「轉製」(Migration)保留下來？一個機構或商業團體或許會保留部份，那麼更多的私人與家庭的資料呢？「數位典藏」會不會成為「數位迷思」與「數位破壞」大家必需小心。

作者為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專任教授暨音像藝術學院院長